

近现代国学资料丛书

主 编 | 纪宝成

执行主编 | 黄朴民 梁 涛

马克锋 编

国学与现代学术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获华民慈善基金支持

马克锋 编

国学与现代学术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学与现代学术/马克锋 编. —桂林:广西
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0. 11
(近现代国学资料丛书)
ISBN 978 - 7 - 5495 - 0002 - 4

I. ①国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国学—思想史—中国—
近代 ②国学—思想史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Z1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6658 号

总 监 制:郑纳新
组 稿:郑纳新
责任编辑:曾雯璐
装帧设计:孙豫苏 赵 瑾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 - 31260822 - 129/139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960mm × 1 380mm 1/16

印张:29.5 字数:400 千字

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6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9 - 2925659)

◎本书获华民慈善基金支持

《近现代国学资料丛书》编委会

主 编

纪宝成

执行主编

黄朴民 梁 涛

学术顾问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方立天 冯其庸 庞 朴 张岂之 张立文 李学勤 傅璇琮

编委会委员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卜宪群	干春松	马克锋	王子今	王炳华	乌云毕力格
纪宝成	孙家洲	刘笑敢	吴 光	陈 来	陈启云
杨庆中	沈卫荣	孟宪实	徐 飞	袁济喜	梁 涛
黄朴民	黄克剑	诸葛忆兵			

总 序

纪宝成

一

本世纪初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所引发的“国学热”，既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，也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完善，国学既是“国魂之学”也是“学科之学”。

对于何为国学，学术界有不同看法，归纳起来大致有三，一是认为国学是我国固有之学术。这主要是就国学的内容而言，认为国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传统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之学，这是最常见的看法。二是认为国学并不完全等于传统学术，而是近代学者受西学的刺激，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，对传统学术的研究、整理，它强调的是世界眼光、现代意识。三是认为国学是“国魂之学”，是一个国家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基础，强调的是国学的价值和意义，它与古代“欲亡其国，先亡其史”的说法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。在我们看来，这三种理解都有一定的合理性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。国学研究总是要以以往的历史为对象，离开了传统学术，国学研究就成了“无米之炊”，国学也就不成其为学了。但我们今天研究国学，不是对传统国学的简单回归与重复，而是以现代的理念为指导，充满明确的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当代精神，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的一种“重构”。从知识上来说，今天的国学应该是更有体系、更有条理，更符合现代学科的要求。同时它又是“国魂”之学，应承担起民族文化重建的使命。

近百年来，由于中华民族遭受到一系列屈辱与挫折，国学的地位遭贬低，国学的价值遭否定，国学的意义遭质疑，国学的未来遭抹黑，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国学几乎成为落后、愚昧的代名词，必须由它来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与灾难承担总责任。这种以激烈批孔、否定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思潮的兴起不是偶然的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，它是不少知识分子极度忧患民族命运、国家前途的积愤之言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理性，因为国学中的确包含有已经不合时宜的思想意识，如极端维护专制的理念、束缚人心与人性的三纲伦理等。然而，真理越过一步即成为谬误，如果因为国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对它加以一概抹杀，全盘否定，显然偏激而片面，是

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,并不可取。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非常复杂,我们决不能简单地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。相反,几千年连续不断、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及其价值体系,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、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等,在战胜外来列强,赢得民族解放,以及中华民族的腾飞和崛起中发挥了积极的、无可比拟的作用。一个人没有灵魂,只能是行尸走肉;一个国家没有魂魄,也不可能长治久安。如果说,在过去的一百年中,国人主要是对传统文化进行“破”的话,我们今天则是要在“破”的基础上着眼于“立”,继承传统国学的优秀、活的传统,同时吸收西方近代以来科学、民主的先进思想,重塑“国魂”,再造中华文化的当代思想体系。“星垂平野阔,月涌大江流”,“国学”是文化之根,是民族之魂。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,决不能成为无根的民族,而应当在历史的亘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,在多元文化的激荡中确定自己的地位,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迈出自己坚定的步伐。

我们视国学之为“国魂之学”,是因为国学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,是我们的精神家园、精神故乡,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,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,是我们伟大民族顶天立地的思想根基、力量根基,也是我们不可战胜的强大自信心的精神源泉。只有国学才可以更好地反映不断变化的“中国形象”,清楚说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,告诉世界“中国人”是什么样的人。只有国学才能客观地描述中国思想、文明和精神的真实状况,说明影响和决定国人行为的内在体系,以及它如何有效支持国家“硬件”的运行。为什么目前社会上“是国学热”,而不是其他学科的“热”?这最好不过地说明,国学适应了时代的需要、社会的需要、人民的需要。重振国学是顺乎天,应乎时,合乎民。当我们一些学者纸上谈兵,喋喋不休地质疑国学的合理性时,广大群众却早已回归国学、接受国学、热爱上国学,因为国学就是他们的精神信仰、生活方式、处事原则,他们需要国学,离不开国学。我们相信,随着国学研究和普及的深入,越来越多的人会接受国学,国学会更好地发挥塑造民族之“魂”、“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”的积极作用。

“国魂之学”意义上的国学可以是广义的,主要表明了一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、立场,凡是从事传统文化研究,包括文史哲的学者,只要是对传统持同情的理解,抱有弘扬的态度,都可归于国学的旗帜之下。从这一点讲,国学不同于一般的传统文化研究,传统文化研究可以是“价值中立”的,甚至是批判的态度,或者是纯粹整理国故的心态。而国学研究则首先需要一种自觉的担当精神,一种强烈的弘道意识。从事国学的人虽然也对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进行批判,但其最终的目的却是为了“返本开新”、“推陈出新”,是为了弘扬、重建中华文化。因此,国学的提出不仅是必要的,而且意义重大。它既是对党中央关于弘扬传统文化,“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”精神的响应,也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学的需要,同时还在广大人文学者中形成一股凝聚力,树立起一面旗帜,将大家统一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来。

二

国学不仅是“国魂之学”，同时也是学科之学。作为“国魂之学”，国学可以是广义的，具有旗帜、统合的作用；而作为学科之学，国学又是具体的，有明确的研究对象、范围、内涵和课程设计，处理好与其他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史哲的关系，是国学健康发展的关键。

国学本是个世纪初一些学者为保存我国固有学术的一种努力和尝试，但面对西学的强势地位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成立的国学研究机构，如北大国学门、清华国学研究院、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等，又纷纷接受、采用了西方分科的方法对我国固有的学术、文化进行分类，一般分为文、史、哲，加上语言、文字、民俗、考古等。这样国学就成为一个过渡阶段，逐渐让位给以文、史、哲为代表的现代学科。不可否认，当时人们采用西方学科体制对国学进行分类有其合理性，文、史、哲等学科在传承古代文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实践，我们有必要回过头对文、史、哲的现代学科进行反思，检讨其中的问题和弊端。如学者指出的，中国传统学术是整体之学、博雅之学、汇通之学，强调知行合一，经世致用，注重义理、考据、辞章的统一，将其放在“西学”的学科门类之下，必然是削足适履，摆脱不了肢解“国学”之弊。例如，经学是中国文化之根，规定了华夏文明的大本大源，塑造了华夏族群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，塑造了我们祖先共同的生活方式。但在文、史、哲的学科体制下，《诗经》变成文学，只能探讨《诗经》中的艺术特色，考证《诗经》中的鸟兽虫鱼，而三家诗、毛诗所体现的诗教精神，三百篇之所以成为“经”的精神，则基本上被排除在外。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，《春秋公羊传》《春秋穀梁传》《仪礼》这些经典完全被排除在现代学科视野之外。而恰恰是这些经书，在历史上曾经对政治的改革、制度的建构、生活方式的变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，但由于它们和现代学科基本上没有重合之处，以至于长期得不到研究，这不得不使人发出“数典忘祖”之叹了。还有，子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，是古代诸子对社会人生的见解与思考，包含了哲学、政治、伦理、教育、科技等丰富的内容。与经学不同，子学不是对经书的诠释、解读，而是通过个人对社会人生的观察、体验，提出系统的思想主张、见解及社会改革的方案，故子学是传统文化中最富有创造力，内涵最为丰富，也最具有个性魅力的部分。但在目前的教育中，子学被分割到文史哲不同学科之中，文学系将《论》《孟》《老》《庄》当文学作品看待，探讨其艺术风格、文体演变；哲学系则将其看做儒、道的哲学经典，研究儒家、道家的思想发展；历史系则将其当史料看待，钩沉其中的人物、事件，结果只能是得其一偏，难窥其整体之美，完整的子学被活活肢解。

其实，以西方的学科分类为标准，把西方看成是现代学科的典范，我们目前的学科分类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。西方除了文、史、哲的学科外，还设有古典学，对古代希腊、罗马文化做整体、综合的研究。这说明，中西古代文化具有相似性，它们都亦文亦

史亦哲,都具有圆融、整全的特点,不可做简单的分科研究,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学科,采取综合式的研究,才能真正深入其堂奥。国学学科的地位和作用,与西方古典学相似,都是对文、史、哲分科的一种补充,是对我国固有学术中那些不能简单地分割到文、史、哲学科中的内容,如经学、子学等,一种整全的研究。

现代教育有一个综合、交叉的趋势,我们不可否认文、史、哲分科的合理性,但在这个基础上还应有新的综合,国学学科的设立,就可以起到这样一个综合的作用。人们常说“文、史、哲不分家”,其实文、史、哲本来就是现代学科分化过程的产物,不存在分家不分家的问题。大家之所以这样讲,意在重申其源头本来是一个整体,应该有综合。但分科既已形成,想要综合已非易事,故海内外许多高校都设立高等人文研究院之类的机构,目的就是为文、史、哲等学科的综合、交流提供一个平台。我们认为,设立国学学科,成立国学院,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科的融合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设有国史、国文等专业,但它与历史系、文学系中的中国历史、中国文学专业并不完全相同,我们更强调经史、文史的会通,打破学科的壁垒,真正继承古代学术的优良传统。所以国学学科一是可以弥补文、史、哲的不足,避免对传统学术的肢解、割裂之弊,二是可以促进文、史、哲的沟通与融合,使其真正做到“不分家”。

总而言之,文、史、哲等学科贡献很大,必须肯定;现行的学科体制存在弊端和不足,有必要改革、完善。而设立国学学科,正是改革、完善现有学科体制的一项重要举措。

三

从清末民初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,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今天,国学的发展经过了几次高潮,其间的起起伏伏,值得人们总结和深思。我们将几次国学运动中的文献进行搜集、整理,分为现代学术、民族国家、经学、子学、国文以及焦点争鸣等题目,编写这套“近现代国学资料丛书”。这套丛书虽然只是资料的性质,但同时也包含了编者对国学发展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沉思考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建立就曾学习、借鉴以往国学机构的经验,国学先行者的实践是我们一份宝贵的财富,继承并超越前人乃是我们的目标。

最后,我要对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关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发展,并给予热情帮助的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!并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国学,支持国学,使国学事业兴旺发达,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,为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添色增光。

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五日

国学与现代学术序

马克锋

近代中国是一个变动剧烈的转型时期,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,新旧思想的交锋吸纳,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、内涵丰富的历史文化画卷。在这一历史画卷中,国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探讨这一时期国学历史命运的起伏兴衰,希望能给当今的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提供一些启示与借鉴。

一、近代国学的发展历程

从1902年梁启超筹办《国学报》开始,到20世纪50年代初无锡国学专修学校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《国学季刊》合并或停刊止,近代国学讨论与研究历经半个世纪。^①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,映照出近代国学的历史命运。大致而言,近代国学经历了晚清十年、民初一二十年、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三个阶段。

晚清十年时期:国学的肇始阶段。1887年,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发表《日本国志》,其中已经提到日本“国学”,可惜没有引起时人的注意。1900年,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,西方联军以武力二度占领中国国都北京,震惊朝野。以此次事件为标志,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转向:其一是民众对政府已经失去信任,不再抱太大的希望,其二是中国社会开始出现“欧化”,特别在青年中表现明显。国学思潮的出现,一是为了挽救中国文化,二是为了改变或抵制“欧化”倾向。1902年,梁启超在日本筹划创办《国学报》,与好友黄遵宪商议,黄遵宪建议创办《国学报》可以暂缓,不妨先撰写《国学史》。随后,梁启超发表了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一文,主张输入西学与弘扬国学并重,不要担忧西学输入会冲击国学。他说:“近顷悲观者流,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,惧国学之从而消灭,吾不此之惧也。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,则其间接之影响,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,吾敢断言也。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,则当转输之任者,必遽于国学,然后能收其效。以严氏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童相比较,其明效大验矣。此

^① 桑兵:《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》,第1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。

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。”^①1902年,章太炎流亡日本,发起成立国学讲习会,系统讲授国学。章太炎所讲的国学内容包括:“一、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;二、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;三、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。”^②1905年,学者江起鹏编写的《国学讲义》出版。该书指出,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,是因为日本奉行“欧化主义与国粹主义相持并进”与“学于人而不至役于人”的学术方针。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也应该走这条路。如何研究国学,该书认为应该坚持这样几个原则:“(一)不徒事诵读,而实奉圣训。(二)不专事诂训,而通知大义。(三)广参世界之学说,以阐发微言。(四)实体先圣之志愿,以普救同胞。一言以蔽之曰,实尊我孔圣者。务去二千年下似是之学说,而还我二千年上真正之孔子。毋拘牵,毋颞颥,毋自封,毋自隘,则庶乎为圆满之国粹主义乎。”^③要求回归先秦,重新振兴古学。1904年,邓实先生发起“国学保存会”;1905年创办《国粹学报》,以“发明国学,保存国粹为宗旨”;1908年成立“神州国学社”。邓实认为:“国学者,与有国而俱来,因乎地理,根之民性,而不可须臾离也。君子生是国,则通是学,知爱其国,无不知爱其学也。”^④“国粹者,精神之学也;欧化者,形质之学也。(欧化亦有精神之学,此就其大端言耳。)无形质则精神何以存?无精神则形质何以立?……国粹也者,助欧化而愈彰,非敌欧化以自防,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。”^⑤国学保存会还计划开设国粹学堂,其学制为三年,科目包括经学、文字学、伦理学、心性学、哲学、宗教学、政法学、实业学、社会学、史学、典制学、考古学、地舆学、历数学、博物学、文章学、音乐、图画、书法、翻译、武事等^⑥,后来因为经费问题而没有实施,但也反映了时人研究国学的宏大设想。

晚清时期,除以上所提相关国学研究机构外,还有章氏弟子马裕藻等人发起的北京国学会、杭州国学会,谢无量、廖平、刘师培、宋育仁等人执掌的成都国学馆(后改名国学学校、国学专门学校),罗振玉、王国维的《国学丛刊》,唐文治的无锡国学专修馆,吴仲、沈宗畸等人的《国学萃编》等。这些国学研究机构的相继建立,无疑推动了国学研究的深入。

这一时期国学研究重点主要在于,通过系统整理国学来保护国学。他们认为,只要国学、国粹能够保存,国家即使灭亡,朝代即使更替,中华民族还是有希望的,中国依然会屹立于世界。但是,如果国学衰微,传统消失,国家即使不灭亡,朝代即使不更替,也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。他们说:“盖以易朔者,一家之事。至于礼俗政教,渐灭俱尽,

① 《饮冰室合集》,文集之七,第104页,北京:中华书局,1989。

② 《国学讲习会序》,《民报》七号,1908年9月5日出版。

③ 江起鹏:《国学讲义》,上海新学会,1906年,第102页。

④ 邓实:《国学讲习记》,《国粹学报》,第2年第19期。

⑤ 许守微:《论国粹无阻于欧化》,《国粹学报》,第1年第7期。

⑥ 《国粹学报》第3年第1期。

而天下亡矣。夫礼俗政教固皆自学出者也,必学亡而后礼俗政教乃与俱亡。”^①“试观波尔尼国文湮灭,而注肖为墟;婆罗门旧典式微,而恒都他属。是则学亡之国,其国必亡,欲谋保国,必先保学。昔西欧肇迹,兆于古学复兴之年,日本振兴,基于国粹保存之论,前辙非遥,彰彰可睹,且非惟强国为然也。”^②“是故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,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。何者,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,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;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,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。此吾国所以屡亡于外族而数次光复,印度、埃及一亡于英而永以不振者,一仅亡其国,一则并其学而亡之也。”^③目的是“用国粹激动种姓,增进爱国的热肠”^④,以实现文化救亡。

民初一二十年代:国学的兴盛阶段。清朝灭亡,民国建立。政权的更替与国体的变更,并没有使刚刚兴起的国学研究夭折,相反,共和体制下的民主、自由气氛,给国学的讨论与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。发端于晚清的国学研究依然进行。1914年,罗振玉、王国维在日本东京重新出版《国学丛刊》。同年,陈尔锡、吕学沅等人先后在东京、北京创办国学扶危社及《国学》杂志。1915年,倪羲抱等人在上海创办国学昌明社与《国学杂志》。章太炎重新出山,在上海系统演讲国学,引起时论的高度关注。

1919年,胡适发表《新思潮的意义》,主张“研究问题,输入学理,整理国故,再造文明”^⑤。1923年,胡适为《国学季刊》写“发刊宣言”,系统提出他的国学观。在这篇宣言中,胡适首先回答了有些人对国学的担心与忧虑。胡适指出,国学并没有沦亡;孔教并不代表整个国学;国学的衰微归咎于西方学术思想的输入。他说:“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;所以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。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;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;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。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,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。……这些行为,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虑的国学之沦亡,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。如果这些举动可以代表国学,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。”^⑥其次,胡适对明末以来三百年的国学研究作了总结,认为在整理古书、发现古书、发现古物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。但同时存在不少缺陷:一是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。“这三百年的古学,虽然也有整治古书的,虽然也有研究子书的,但大家的眼光与心力注射的焦点,究竟只在儒家的几部经书。古韵的研究,古词典的研究,古书旧注的研究,子书的研究,都不是为这些材

① 潘博:《国粹学报叙》,《国粹学报》第1年第1期。

② 《拟设国粹学堂启》,《国粹学报》第3年第1期。

③ 许守微:《论国粹无限于欧化》,《国粹学报》第1年第7期。

④ 汤志钧编: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,上册,第212页,中华书局,1979。

⑤ 欧阳哲生编:《胡适文集》,2卷,第551页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7。

⑥ 欧阳哲生编:《胡适文集》,3卷,第5页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7。

料的本身价值而研究的。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!”^①二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。“清儒有鉴于宋、明学者专靠理解的危险,所以努力做朴实的功力而力避主观的见解。这三百年之中,几乎只有经师,而无思想家;只有校史者,而无史家;只有校注,而无著作。”^②三是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。“他们排斥异端;他们得着一部《一切经音义》,只认得他有保存古韵书古词典的用处;他们拿着一部子书,也只认得他有旁证经文古义的功用。他们只向那几部儒书里兜圈子,兜来兜去,始终脱不了一个‘陋’字!”^③胡适最后指出:“我们现在治国学,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,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。……我们认清了国学前途的黑暗与光明全靠我们努力的方向对不对。因此,我们提出这三个方向来做我们一班同志互相督责勉励的条件:第一,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。第二,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。第三,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。”^④

无锡国学专修学校、北京大学国学门、清华国学研究院、厦门大学国学院、齐鲁大学国学所等一批国学专门研究机构在这一时期相继建立。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后,高举“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”的大旗,借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之声威,迅速在学术界崛起,以致国内一些高校纷纷起而效之。1923年4月,东南大学国文系议决设立国学院,并制定了系统整理国学的计划书。1925年底,厦门大学也开始筹建国学研究院,并于次年,在原北大国学门成员沈兼士、林语堂、周树人、顾颉刚等人的加盟下,按照国学门的模式,制定了厦大国学院《研究院章程》和《办事细则》,设立了考古学会和风俗调查会等机构。而1928年1月正式成立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,不但主事者中顾颉刚、商承祚、容肇祖等多出自国学门,在组织体制上,其所设之考古、语言、历史、民俗四学会,亦多仿国学门而来。清华于1925年设立国学研究院。首批聘请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、陈寅恪为教授,李济为讲师。课堂演讲有王国维的《古史新证》、《尚书》,梁启超的《中国通史》、《历史研究法》,赵元任的《方言学》,陈寅恪的《西人之东方学目录学》,李济的《民族学》、《考古学》等;指导学生进行的专题研究,有王国维的《上古史》、《金石学》、《中国文学》,梁启超的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中国哲学史》、《中国文化史》、《宋元明学术史》、《清代学术史》、《东西交通史》、《中国史》、《史学研究法》,赵元任的《现代方言学》、《中国音韵学》、《中国乐谱乐调》,陈寅恪的《年历学》、《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》,李济的《中国人种考》等27个科目,细目则有37种。至1929年,招收74人,除2人退学与4人病故外,实际完成学业者68人,其中有姜亮夫、姚明达、王力、徐中舒、陆侃如、杨鸿烈、谢国桢等,成为国学研究的一支生力军,同时推出涉及多种学

① 欧阳哲生编:《胡适文集》,3卷,第7页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7。

② 欧阳哲生编:《胡适文集》,3卷,第8页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7。

③ 欧阳哲生编:《胡适文集》,3卷,第9页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7。

④ 欧阳哲生编:《胡适文集》,3卷,第15页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7。

科的成果。与大学教育相呼应,各类学术刊物竞相问世,成为发表国学研究成果的阵地与平台,如北大的《研究所国学门月刊》、《国学季刊》,东南大学的《国学丛刊》、《国学研究会讲演录》及国学丛书,清华的《国学论丛》、《实学月刊》及教授主编的丛书(注:如王国维的《蒙古史料四种校注》、陈寅恪的《大宝积经论》、李济的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》、赵元任的《现代吴语的研究》等),燕京大学的《燕京季刊》。受此影响,有的报纸也开辟了副刊,如《民国日报》的“国学副刊”等。

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:国学的衰弱阶段。1927年,被新旧学人共同尊奉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;1929年,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梁启超去世于北平协和医院。国学研究领军人物的谢世,直接影响和削弱了国学的研究与发展。1927年,成立不到一年的厦门大学国学院宣布解散。1929年,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也宣布解体。“九月,清华改属教育部,改为国立大学,研究院国学门撤消。”^①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改名为国学馆,师资严重外流。国学大师的相继离世及国学研究机构的先后解散,无疑是曾经一度兴盛的国学研究转向的一个标志。另外,在国学研究的热潮中,社会上也出现了一种借用国学而宣扬民族主义的情绪,反对学习西方现代民主与科学。一时,泥沙俱下,鱼龙混杂。对此,一场批判国学的思潮开始形成。1929年,何炳松发表《论所谓的“国学”》一文,批评国学泛滥。他说:“我觉得近来国人对于国学一个名词,或者误会他的意思,或者利用他的名义,来做许多腐化的事情。我以为如此下去,不但我国学术有永远陆沉无法整理的危险,而且由国学两个字生出的流弊层出不穷,将来一定要使得我国的文化永在混乱无望故步自封的境界里面,我因为见到这种情形,所以要仿现在时行的办法,提出一个口号来,这个口号就是:‘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!’”其理由是:国学两个字的来历很有点不清;国学两个字的意义广泛模糊,界限不清;国学两个字犯了我国向来囫囵吞枣的大毛病,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;以一团糟的态度对待本国的学术。这就国学本身而言,稍微引申一点,“国”字风行时髦,也折射出国人一种自我炫耀、狂妄自大的民族主义或小国家主义的情绪。何炳松说:“我国近来‘国’字的风靡一时,好像中国无论什么一种丑东西,只要加上一个国字,就立刻一登龙门,声价十倍的样子。五更天、十八扯的调子,现在不叫小调而叫做‘国乐’了。卖狗皮膏药的勾当,现在不叫走江湖而叫做‘国医’了,甚至前一个月上海四马路上的混沌铺,亦要叫做‘国菜馆’了。这样类推下去,那末,小脚、辫子、鸦片等等东西,亦都可以叫做‘国脚’、‘国辫’或者‘国烟’了。这不但弄得‘斯文扫地’,而且‘国’字竟变成妖魔鬼怪的护身符了。这不是国学两个字所引出来的流弊么?我们要澄清本源,当然非先将谬种拔去不可。这亦是国学应该推翻的一个理由。”^②郑振铎也随后发表《且慢谈所谓“国学”》,支持何炳松的观点。

① 浦汉明编:《浦汉清文史杂文集》,第262页,清华大学出版社,1993。

② 何炳松:《论所谓的“国学”》,《小说月报》,第20卷,第1号,1929年1月10日。

国学衰弱,原因固然很多,如文化激进主义者对国学的攻击与批判。吴稚晖的言论颇有代表性:“这国故的臭东西,他本同小老婆、鸦片相依为命,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。国学大盛,政治无不腐败。”^①但主要原因还是国学的概念不清,分类含混。无论是国粹也好,国学也罢,即使是新派人物提出的国故学也不例外。钱穆指出:“学术本无国界。‘国学’一名,前既无承,将来亦恐不立。特为一时代的名词,其范围所及,何者应列国学,何者则否,实难判断。”^②陈独秀认为,“国学”这一名词,“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,因为‘国学’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”。^③曹聚仁试图以国故学替代国学。他批评国学说:“国学二字,浮动于吾人之脑际者经年矣。闻有一二博学者不察,用以为中国旧文化之总摄名词,逐流者乃交相引用;今之国学如麻,略识‘之无’,能连缀成篇,谓为精通‘国学’;啻唔诗赋,以推敲词句自豪者,谓为保存‘国粹’。他则大学设科研究中国文学,乃以国学名其系;开馆教授四书五经,乃以国学名其院。人莫解国学之实质,而皆以国学鸣其高。势之所趋,国学将为国故学之致命伤。国学一日不去,国故学一日不安。斩钉截铁,惟有轰之一法。”^④他说:“国学无确定之界说,无确定之范围,笼统不着边际,人乃得盗窃而比附之。故为澄清学术界空气计,不能不轰国学。科学之研究,最忌含糊与武断,而国学二字,即为含糊与武断之象征。……如之何其可不轰耶?”^⑤曹聚仁炮轰国学,他的国故学同样遭到别人批评。许啸天指出:“‘国故学’三个字,是一个极不彻底极无界限极浪漫极浑乱的假定名词;中国的有国故学,便足以证明中国人绝无学问,又足以证明中国人虽有学问而不能利用。”^⑥随着新式学科门类的完善,原属于国学核心内容的历史学、哲学、文学及考古学相继独立,国学衰弱亦在情理之中。

二、近代国学讨论的主要内容

近代国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,主要围绕国学的定义、国学的分类、国学的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。

第一,关于国学的定义。国学基本上是一个外来词,容易产生歧义。经学、古学、中学、旧学、国粹、国故也是国学的不同表达,与哲学、洋学、西学、新学等相对应。概括起来,关于国学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。

① 《吴稚晖学术论著》,第124页,上海出版合作社,1925。

② 钱穆著:《国学概论》,弁言第1页,商务印书馆,1997年7月北京重印本。

③ 任建树等编:《陈独秀著作选》第2卷,第516—517页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3。

④ 许啸天编:《国故学讨论集》,第84—85页,群学社,1927。

⑤ 许啸天编:《国故学讨论集》,第92—93页,群学社,1927。

⑥ 许啸天编:《国故学讨论集》,第3—4页,群学社,1927。

国学即一国之学,即中国学术的总称。《国粹学报》主编邓实的国学定义是:“国学者何?一国所有之学也。有地而人生其上,因以成国焉。有其国者有其学。学也者,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,而自治其一国者也。”^①吴宓认为,“兹所谓国学者,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。”^②郑奠在《国学研究方法总论》中指出:“愚谓国学之范至广,凡域内固有之学,无间于心与物皆隶焉。即至方技艺术,有理可究,有法可守,有益于民者,亦得被此称。固非词章之士所能专也。”^③蔡尚思认为:“国是一国,学是学术,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。其在中国,就叫做中国的学术。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,那就无所不包了;既然无所不包,也就无所偏畸了。……仁者见之谓之仁,智者见之谓之智。此皆仅得其一端,而尚未得其大全。在吾却终始以为:中国的固有文化,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。”^④

国学是区别于“君学”的中国思想文化。这种观点在晚清国粹派中比较流行。他们认为,所谓国学,主要是指中国先秦时期的学术。那个时期,“不独九流各成其学也,即学术相同者亦多源远流分,如儒分为八,墨流为三是也。思想日昌,人才日盛”,“言论思想之自由,至战国而极”。^⑤这是国学的繁荣与兴盛时期。秦汉以后是“君学”时代。“吾神州志学术,自秦汉以来,一君学之天下而已。”具体而言,“其制度文物,则君主之制度文物也;其人材学术,则君主之人材学术也;其历史,则君主一人之历史也;其宗教,则君主一人之宗教也”。^⑥邓实指出,秦始皇焚书坑儒成为国学衰亡、君学建立的标志性事件。“自汉立五经博士而君学之统开,隋唐以制科取士而君学之统固;及至宋明,士之所读者功令之书、所学者功令之学。遥遥二千年神州之天下,一君学之天下而已,安见有所谓国学者哉?”^⑦国粹派认为,国学乃中国文化之正宗,君学是中国文化之变异。国学代表自由、平等,君学乃是专制独裁的同义语。二者几成水火,势不两立。国粹派倡导国学,反对君学,具有明显的政治含义。

国学即国故学。曹聚仁极力鼓吹国故学,认为它是一门科学。曹聚仁对国、国故、国故学三个词分别加以诠释。关于“国”:“中华民族所组织之国家,曰中国。故‘国故’之‘国’,乃专指中国而言,非泛称也。‘故’之义为‘旧’;以今语释之,则与‘过去’二字相当。”关于“国故”:“中华民族在过去三千年间以文字表达之结晶思想也。”不包括非结晶思想与物质文化部分。关于“国故学”:“记载此思想之生灭,分析此思想之

① 邓实:《国学讲习记》,《国粹学报》第2年19期。

② 吴宓:《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》,《清华大学史料选编》,第1卷,第374页。

③ 洪北平编:《国学研究》,第3页,上海民智书店,1930。

④ 蔡尚思:《中国学术大纲》,第5页,上海启智书局,1931。

⑤ 转引罗志田:《国家与学术:清季民初关于“国学”的思想论争》,第39页,三联书店,2003。

⑥ 罗志田:《国家与学术:清季民初关于“国学”的思想论争》,第35页,三联书店,2003。

⑦ 邓实:《国学真论》,《国粹学报》,第3年第2期。

性质,罗列此思想之表现形式,考察此思想之因果关系,以合理的、系统的、组织的方式述说之者也。简言之,国故学者以‘国故’为研究之对象,而以科学方法法理之,使成为一科学也。”^①沈亦云也大致持此观点:“凡本国前贤往哲最高思想之结晶,讨论人生必要与人生有趣味之问题,发为有系统之学说,其影响于此国,有极长之时间性;其应用于此国,有极广之普遍性;其代表此国,有极大之显著性;谓之国学。”^②胡适明确支持这一观点,他说:“‘国学’在我们的心眼里,只是‘国故学’的缩写。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,都是我们的‘国故’;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,就是‘国故学’,省称为‘国学’。‘国故’这个名词,最为妥当;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,不含褒贬的意义。‘国故’包含‘国粹’;但他又包含‘国渣’。我们若不了解‘国渣’,如何懂得‘国粹’?”^③但是,曹聚仁不同意胡适的看法。他说:“斯言妄也。胡氏之说,殆迁就时俗而为之曲解耳。抑知‘国故’二字之重心在‘故’;于‘故’,乃知所研究之对象为过去文化思想之僵石,乃知此研究对象已考终于‘五四运动’之际,乃知此研究之对象与化学室之标本同其状态。如果去‘故’而留‘国’,则如呼‘西瓜’之为‘西’,‘太阳’之为‘太’,闻者必茫然不知所云。故愚以为国故学必当称为‘国故学’,决无可省之理。”^④毛子水认为,“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”;站在现代的角度,运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“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”,就是国故学。

此外,蒙文通认为国学就是经学;^⑤邵祖平认为,国学就是国文学;^⑥顾颉刚认为,国学就是历史学。^⑦还有人认为,国学就是考古学。^⑧综观近代关于国学定义的争论,始终没有得出一个被人们共同认可的概念。“‘国学’也好,‘国故学’也好,均尚未能确立自身的学术典范,其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。”^⑨从这个意义上来,国学的研究任重而道远。

第二,关于国学的分类。定义与内涵搞不清楚,分类自然就很困难。见仁见智,莫衷一是,也成为国学分类的现实困境。

一是特定的中国学术史。章太炎所讲的国学内容包括:“一、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

① 曹聚仁:《国故学大纲》上卷,第7、4、7页,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社,1925。

② 沈亦云:《国学入门》,第4页,南屏女中印。

③ 欧阳哲生编:《胡适文集》,3卷,第10页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7。

④ 许啸天编:《国故学讨论集》,第90—91页,群学社,1927。

⑤ 罗志田:《国家与学术:清季民初关于“国学”的思想论争》,第366页,三联书店,2003。

⑥ 邵祖平:《国学导读》序,商务印书馆,1947。

⑦ 顾颉刚: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》,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》第2卷第13期,1926。

⑧ 转引自罗志田:《国家与学术:清季民初关于“国学”的思想论争》,第400页,三联书店,2003。

⑨ 罗志田:《国家与学术:清季民初关于“国学”的思想论争》,第366页,三联书店,2003。

原;二、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;三、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。”^①王易的分类是:“经学、小学、哲学、史学。”^②钟泰的分类是:“六书篇、声韵篇、章句篇、六艺篇、诸子篇、目录篇、汉宋异同篇、文章体制篇。”^③李笠的分类是:哲学部:群经哲学、诸子哲学、释氏哲学、哲学史;史学部:别史、通史、史志、史论;文学部:总集、专集、小说、文评;小学部:形义、声韵;类书辞典部。^④吴文祺的分类是:考订学;文字学;校勘学;训诂学。^⑤

二是中国学术史。汪震、王正己的分类是:“经学、史学、哲学、自然科学、文学、文章的派别、文字学、清代学术史。”^⑥黄毅民的分类是:“语言文字学、文学史、经学、史学、哲学史、科学。”^⑦马瀛的分类是:“(一)经学;(二)哲学(诸子学、理学、佛学);(三)史学;(四)文学;(五)其他学术(神秘学术、美术学术、应用学术、自然学术)。”^⑧

三是中国文化史。胡适指出:“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,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系统:中国文化史:(一)民族史;(二)语言文字史;(三)经济史;(四)政治史;(五)国际交通史;(六)思想学术史;(七)宗教史;(八)文艺史;(九)风俗史;(十)制度史。”^⑨曹聚仁的“国故学”分类,其实也是一个中国文化史的框架结构:“甲、文学:平民文学、贵族文学、平民化文学、病态文学。乙、史学:丙、哲学:道家、儒家、墨家、法家、佛学、宋明理学、东原哲学。丁、人生哲学:戊、政治学:己、文字学:训诂学、音韵学。庚、论理学。辛、心理学。壬、天文学。癸、算学。子、其他科学。丑、宗教。寅、美术。”^⑩

第三,关于国学的研究方法。如何研究国学,学者们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与研究心得,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

章太炎 1906 年前后在日本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,先后讲授了《论语言文字之学》、《论文学》、《论诸子学》等,没有讲如何研究国学的方法。1922 年,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,在上海讲授国学。其中,讲到研究国学的五个方法:辨书籍真伪;通小学;明地理;知古今人情的变迁;辨文学应用。^⑪所谓“辨书籍真伪”,就是要搞清楚古书的版本,知晓哪些是真本,哪些是伪书,如果真伪不辨,必将事倍功半。所谓“通小学”,必须认识古代的文字。小学分训诂、形体、谐声三种。因为古代文献,有些是古时的白

① 《国学讲习会序》,《民报》七号,1908 年 9 月 5 日出版。

② 王易:《国学概论》,第 5—7 页,神州国光社,1932。

③ 钟泰:《国学概论》,目录第 1—2 页,中华书局,1936。

④ 转引自马瀛:《国学概论》,第 17 页,上海大华书局,1934。

⑤ 许啸天编:《国故学讨论集》,第 42 页,群学社,1927。

⑥ 汪震、王正己编:《国学大纲》,目录,北平人文书店,1933。

⑦ 黄毅民:《国学丛论》,目录,北平燕友学社,1936。

⑧ 马瀛:《国学概论》,第 19 页,上海大华书局,1934。

⑨ 欧阳哲生编:《胡适文集》,3 卷,第 15 页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7。

⑩ 曹聚仁:《国故学大纲》上卷,第 5—7 页,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社,1925。

⑪ 汤志钧编: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,下册,第 669 页,中华书局,1979。